

貴州省文史研究館 編

民國貴州文獻大系

第三輯 上冊

● 蠓園文存

朱启鈴 著

● 匏齋集

任可澄 著

● 蛰庐丛稿

邢 端 著

蠓園文存

今日籌蒙之策有六要亦有二道六要者關
端而必須抱定此旨者也二道者視吾今日形
其一以爲措施之方者也請言六要一曰齊
於三省將軍而統於一盟長政令之頒布往往
疑信參半又以政令之相殊積久而各成習慣
歧然無齊一之辦法自三省改設貴州政令始
然後十旗之觀聽齊將來一切辦法便當合入
同者更爲之融化而芟削焉此專一蒙情之要
敝十餘年來受外力之牽引者久矣蓋爭襲
限制之馬賊之擾害吾無以安靖之外人之
墨困於盜賊兵戎積此數者之累遂成債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三辑（上册）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整理编辑委员会

总 顾 问	龙志毅			
顾 问	蒋南华	范同寿		
主 任 委 员	顾 久			
副主任委员	王德玉	沈志明	杨玉和	靖晓莉(常务)
编 委	(以姓氏笔画为序)			
	于民雄	王 羊 勺	王尧礼	何 萍
	张伟云	张祥光	张新民	李立朴
	李华年	陈 琳	翁家烈	黄万机
	程亦赤	谭佛佑		

编辑部

主 任	王尧礼			
副 主 任	陈丹阳	陈 琳		
编 辑	王尧礼	何 萍	陈丹阳	胡海琴
	郎启飞	汤苏婷		

总 序

顾 久

“文献”一词最早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以为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”。就是说文指典籍文章，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、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。宋元之际的马端临著《文献通考》，以为“文”是经、史、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，“献”是臣僚奏疏、诸儒之评论、名流之燕谈、稗官之记录，他将文献的外延缩小了，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，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，则不能称之为文献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“文献”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除了泛指古籍外，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、古物、模型、碑文、绘画等，统称为“历史文献”。一九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文献著录总则》关于“文献”的定义是“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”。“知识”是文献的核心内容，“载体”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，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。也就是说，除书籍、期刊等出版物外，凡载有文字的甲骨、金石、简帛、拓本、图谱乃至缩微胶片、视盘、声像资料等等，皆属文献的范畴。“民国贵州文献大系”的“文献”，就是这个变化、扩大了的概念。

我国向称文献之邦，历代所积，浩如烟海，民国文献，又数倍于古代。原因是中华民国虽然短暂，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，短短三十八年间发生了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国，军阀混战，外敌侵略，国共两党空前大内战及政权易手等重大事件，真正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时代的多故，学术文化的繁荣，新闻出版的发展，印刷技术的进步，使这

个时期的文献数量剧增,种类繁多,涵盖图书、期刊、报纸、手稿、书札,还包括海报、老照片、电影、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文稿、日记、传单、商业契约和票据等。据初步估算,国内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。数量最多、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献,本应得到整理利用,但恰恰相反,全国各省甚至各大图书馆、博物馆大抵都是一笔糊涂账。而且民国时期正处于由手工造纸向机械造纸转化的初级时期,造纸材料混杂,制浆工艺落后,多为机械磨木浆纸和酸性化学浆纸,导致纸张酸性强,质量差,保存期短,经过百十年后,大多早已黄脆不可触摸。所以,抢救、整理出版民国文献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。二〇一〇年省文史馆向省政府建议编纂“民国贵州文献大系”,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,很快就批准了,并拨出了专项经费。为此,省文史馆组成了编委会和编辑部,邀请有关单位、专家学者座谈,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,拟出了一个粗目,依靠馆内外的力量,搜集、整理、编纂。

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决定说: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”又说:“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、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、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,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。”一个国家是这样,一个省也是这样。东南诸省从自然风光来说,并不一定优于贵州,但游人趋之若鹜,主要还是那里的人文积淀深厚。文化的吸引力、向心力、凝聚力就显示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地方。胡锦涛同志曾说:“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,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,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。”这就为我们指出了具体的工作方向。我们贵州本来文化积淀不如东南各省深厚,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,但贵州文化自有其独特之处。贵州人在中国近代化、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,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,这说明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深厚的潜力,只是整理、发掘不够,不及时,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相一致,影响了我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。所以,整理出

版民国年间的贵州文献,是增加本省文化积淀的重要的、不可或缺的工作,是增强贵州人的自信心、向心力、凝聚力的重要手段,也是增加影响力、吸引力,提高贵州的知名度的重要手段,符合中央大的精神与胡锦涛同志的指示,符合省委、省政府建设旅游大省、工业强省的战略。

这项工作,得到了贵州省图书馆、贵州省博物馆和很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,并力襄助,在此,我代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深表谢忱。

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丛书收录的文献起讫时间主要为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(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),写作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后,内容重要的著述,也酌量收入。

二、本丛书所收文献,以已出版的图书、期刊及未刊稿为主,以书刊报纸辑录为辅。

三、本丛书力图反映贵州民国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学术、民族、风俗、物产等方面的内容,收录的是贵州人的著作及省外人士关于贵州的著作,主要涉及文、史、哲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献,包括契约、票证、摄影、绘画等作品。

四、本丛书以标准规范简体字及现代通用标点进行整理,横式排印;人名、地名、机构名倘无一一对应的简体字,为避免歧义,不作改动;常见异体字、通假字亦予保留;书中明显的错别字径改,一般不出校,也不加注。不可少的说明、校、注置于本页脚。原文不能辨识的,用□代替。

五、书中的数字及个别特殊的字词(如的、地、得等)因打上了时代的烙印,故保留原来的用法,不作改动。数字用法,一依原著,而不改作阿拉伯数字。

六、本丛书分辑出版,每辑分为上、下两册或上、中、下三册,每辑二十至一百万字左右;字数较少的著作,合几种为一辑。每辑的内容不一定类同。

七、每册前冠以总序、出版说明;每一种著作前冠以一篇整理前言

(个别著作情况特殊,可不称“整理前言”),介绍本书的内容、价值及其作者、整理情况等。

八、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的字眼如“狃”、“瑶”等,本丛书随文改为“仲”、“瑶”,有的改后反生歧义,可保留原貌,但一书必须统一,不可出现不同的写法。另有部分字句对一些历史事件,对少数民族的记述、评价不客观、不全面,甚至是歪曲,删改恐影响文献的原貌,故亦仍其旧,请读者注意辨别。还有一部分著作尤其是本省官方和持官方立场人士的记载、著述,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、中共人物的称谓也是当时政治背景的实录,鉴于本书为文献性质,应当遵守文献整理的原则,保持文献原貌,敬希读者明鉴为荷。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三辑(上册)

目 录

蠖园文存	(1)
匏斋集	(205)
蛰庐丛稿	(355)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三辑（上册）

蠖园文存

朱启钤 著

龚勤舟 整理

王尧礼 审订

整理前言

紫江朱启钤先生，字桂辛，号蠖公，是近代中国的著名人士，旧时有很高的知名度，现在人们也还不时提起他。如央视的一位著名记者前两年就写过一篇长文，题为“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——朱启钤”。作者取这样一个标题，大概是感叹今昔领导干部的不同吧。

朱先生做过清末的东三省蒙务督办、津浦铁路督办、京师外城警察厅厅丞，民国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、交通部总长，一度代理国务总理，确乎是一个领导干部，而且是高级领导干部。他跟今天的领导干部有什么不同呢？简言之，是政绩和其他成就的不同，根本上是个人文化修养、文化视野、文化胸怀的不同。

民国初年，朱先生先后任内政、交通两部总长。内政总长还要兼督北京市政，他主持改建正阳门城楼，打通东西长安街、南北长街，开放南北池子，扩大天安门广场，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——中央公园，修筑环城铁路，开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——古物陈列所，创建传染病医院，扩充游民习艺所。在这之前，北京是没有市政建设的。后人评价说，朱先生是将北京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。这些大事，都是他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、人力物力财力都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。

可惜到了民国五年，他因为支持袁世凯称帝下台了。特赦后虽被选为国会参议院副议长而未就任，从此淡出政治。一九一九年出任南北和谈北方总代表，也只是以大总统徐世昌私人代表的身份。这次失败的和谈却促成了他一生最大、最为人称道的成就——创设中国营造学社。

他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一册影宋本《营造法式》，这是我国土

木建筑的第一要笈。作者李诫，字明仲，宋代营造家、负责宫室营建的官员。《营造法式》是他奉勅编纂的，编于熙宁年间，成书于元符三年，刊行于崇宁二年。全书三十六卷，按内容可以分作名例、制度、功限、料例、图样五个部分，其中用很大的篇幅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，包括壕寨、石作、大木作、小木作、雕作、旋作、锯作、竹作、瓦作、泥作、彩画作、塼作、窑作共十三种一百七十六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，而且各种木制构件、屋架、雕刻、彩画、装修等都有详细图样。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、施工的规范书，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。我国匠艺往往通过口耳相传，很少见于记载，这部书更是集大成之作。平生关注匠艺的朱先生见之大喜，搜集他本汇校后重刊。

《营造法式》的重刊，引起了国内外关心中国建筑艺术人士的浓厚兴趣，朱先生乘势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。时为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。他在学社成立《缘起》中说：“方今世界大同，物质演进，兹事体大，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，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。启铃无似，年事日增，深惧文物沦胥，传述渐替，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，纠合同志若而人，商略义例，分别部居，庶几绝学大昌，群才致用。”学社原拟名“中国建筑学社”，后以范围过狭而改名。朱先生解释说：“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，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，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，故挾破此范围而名以‘营造学社’，则凡属实质艺术无不包括。由是以言，凡彩绘、雕塑、染织、髹漆、铸冶、抁植，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，推而极之，凡信仰、传说、仪文、乐歌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，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。”可见其学术眼光之广阔高远。

他以自己深广的人脉，聚合了一大群中外学界、工商界、金融界、政界的精英分子，仅我熟习学界人士就有陈垣、袁同礼、马衡、叶恭绰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陈植、叶公超、刘敦桢、单士元、刘宗江、李四光、谢国桢、李济，这些人分属历史、考古、外国文学、建筑、地理、地质等学科，可见朱先生将中国营造学研究置于一个非常广阔的多学科背景里。尤其是

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的加盟,是学社立即活跃起来。他们刚从国外学成归来,学贯中西,又热爱中国建筑艺术,年青力壮,精力旺盛,在学社的组织下,他们展开了对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等省古建筑遗存的调查,取得了丰富的资料,撰写了大批价值极高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,并在此基础上校订、研究《营造法式》。抗战期间,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、刘致平流亡西南,成立营造学社分社,继续进行西南建筑、雕塑的调查和研究,并恢复《营造学社汇刊》。抗战胜利不久,由于朱先生散尽了家财,经费山穷水尽,学社名存而实亡。

中国营造学社存在十五年,正常工作实际只有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七年。在短短七年里,完成了古建筑二千七百八十三处、建筑群二百零六组的调查,基本理清了我国建筑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源流,共出版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七卷二十二期,图书三十一一种,以后梁思成的名著《中国建筑史》《中国雕塑史》也是建立在这七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。这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建筑之始,而且成就巨大,此后再没有超过中国营造学社的水平。邓云乡先生认为,现在尚存的北京协和医院、燕京大学现北大、北海图书馆、南京中山陵藏经楼等,一大批中国宫殿式美轮美奂的建筑物的出现,不能说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没有关系。营造学社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古建筑人才,他们都对朱先生很尊敬,执弟子礼,梁思成、刘敦桢尊称“桂师”,刘宗江、刘致平、陈从周辈更是如此。可惜这些人才以后在厚今薄古的环境下未得大用。

朱先生还是成功的实业家,辞官后经营中兴煤矿,创办中兴轮船运输公司,开银行,这些都是很赚钱的生意。有人说朱先生历晚清至民国而不倒,主要是因为有钱,尤其是北洋政府时代,执政者走马灯似的换,但不管谁上台都需要钱,需要会弄钱的人。此语大抵不错,但他不同于其他有钱人,他的钱花了不少在创办中国营造学社、开发北戴河、出版古籍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
以上是朱先生一生事功的荦荦大端。

朱先生集官僚、实业家、营造学家、文物收藏家于一身,尤其对文化

上贡献甚钜，然其出身并非科举高第，其才干是天赋加勤奋，主要靠历练而来的。好些书，包括权威的《中国近代史词典》《辞海》都说他是举人，但朱先生自撰年谱却只字未提。中举是旧时代人生大事，成了举人，小可光宗耀祖，大可以有了做官的初步资格，倘实有其事，焉能不著一笔？不要说中举，连考秀才都没有记载。他是靠姨父瞿鸿禨代捐一个府经历起家的。

其家本黔之开州，民国改紫江县，又改开阳县。却出生在河南信阳，外祖父傅寿彤的南汝光兵备道署，三岁丧父，与母亲依外家为生，由河南而湖南。二十岁时姨父瞿鸿禨提督四川学政，将先生带往四川历练。他长于做事，瞿倚为左右手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瞿离任，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府经历，从事盐务管理、开凿险滩等事。这是朱先生接触工程之始，从此对土木建筑兴趣不减。后从瞿赴江苏，入京师，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、署京师内城巡警厅丞，旋调外城巡警厅厅丞，创办京师警察、市政，光绪末调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，津浦铁路北段总办、全线督办。当时风气未开，新政被另眼相看，科举出身的人不愿也不屑做，朱先生思想没有这样多束缚，勇于承担，而且能够做得很好。以他的才干，又通过徐世昌的介绍，朱先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，袁氏当了大总统，就委之为内务总长，还兼了一任交通总长。

朱先生一生得到三个人的提携、重用，最早是瞿鸿禨，其次是徐世昌，再次是袁世凯。袁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他感恩图报，以致支持袁氏称帝复辟。帝制失败，他被通缉，逃往天津，两年后被赦免。从此离开官场，专心办实业，余力则收藏古籍、器物、丝绣，研究传统工艺，整理出版亲友遗著。后来创办中国营造学社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袁氏复辟事件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，朱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九十寿辰时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花篮祝贺，他也邀请周到家里作客，吃贵州菜。

朱先生是贵州人，虽然终生未履乡土，但对家乡的感情还是有的。他外祖父傅寿彤是贵阳名士，进士出身，历任河南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，

外祖母与其祖母是亲姊妹，同出贵阳刘氏，他的两个姑母嫁给他的两个舅父。咸丰、同治间贵州战乱，朱、傅两家人都逃往河南依傅寿彤住，一家上下数十口都操贵阳话。他三岁时父亲溺水死，他随母亲傅梦琼在外家长大，他的第二位夫人是贵阳于氏，从小到老，耳边都缠绕着乡音。她母亲做得地道的贵阳菜，而做得最多的是豆腐、豆豉，因为他外祖父母喜欢故乡的家常菜。晚年编家乘回忆母亲，用两千五百字专门写豆腐、豆豉的做法、种类，津津有味，细致入微。樱桃斜街贵州会馆，是周渔璜先生去世后，其父捐邸宅为会馆，是为第一个贵州会馆。康熙年间的老宅，几经维修，至民国又已破败不堪，朱先生捐款一万四千银元维修、扩建，并作记。先生一直注意搜集乡邦文献，他整理出版了其外祖父傅寿彤的《澹勤室诗》、贵阳名士杨文照的《芋香馆诗》。贵州文献徵辑馆在纂修《贵州通志》的同时编辑出版《黔南丛书》，朱先生与邢端先生在北京也编印一部分，由朱先生出资刊印，是为别集，如明马士英《永城纪略》《永牍》等。黄彭年《陶楼诗钞》辑录已在五十年代，沧桑巨变，朱先生的产业荡然无存，只能蜡版油印。这些细事可以见出先生对乡土的关爱。

朱先生晚年将藏书捐献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。后又改变主意，要求北图将其中的贵州文献转赠贵州省图书馆。北图回复，没有复本两个以上的仍留在北图，但可制成缩微胶片交给贵州，复本超过两个的则赠送贵州。现在贵州省图书馆钤有“紫江朱氏藏书印”的旧籍和刻写油印的地方文献，都是朱先生的馈赠。他从抗战时就开始搜集编纂《贵州碑传集》，到九十多岁时还在增补，这也是他对家乡的一份文化责任感使然。

朱先生的著述有《螭园文存》，编纂有《存素堂丝绣录》《紫江朱氏家乘》。《螭园文存》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，铅印线装，一函两册。函套和封面由祝书元题写，扉页由章梈所书。前有祝书元、瞿宣颖两序，末有作者跋文一篇。文分上中下三卷，卷上、卷中收任官时的公牍，卷下主要是书序、长辈行述墓表文字，共文章七十三篇。先生